

“两个不能否定”的理论依据、历史镜鉴及现实意义

李风晓,李宏伟

(首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48)

摘要:对于如何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两个不能否定”,并清晰阐明了两个历史时期的本质特征和历史定位,认为它们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对“两个不能否定”予以深入条析,不难发现其具有理论、历史和实践上的合理性及重要现实意义。从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新中,可以寻得“两个不能否定”的理论依据;从中国近代救亡图存史、苏共发展史和中共奋斗史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中,可以获得“两个不能否定”的历史镜鉴;而且,“两个不能否定”作为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重要遵循,对于正确认识党的历史进而坚定历史自信至关重要,同时也对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两个不能否定;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23)05-0001-09

DOI:10.16160/j.cnki.tsxyxb.2023.05.001

On the Theoretical Basis, Historical Lessons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wo Can-Not-Deny’s”

Li Feng-xiao, Li Hong-wei

(School of Marxism,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Abstract: As for how to correctly tre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periods before and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put forward the view of “Two Can-Not-Deny’s”, and clearly expounded the essence and historical orientation of the two historical periods. He believes that both periods are practical explorations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led by the CPC. By analyzing the viewpoint of “Two Can-Not-Deny’s”, 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that it is reasonable and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ory, history and practice. From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Marxist theory and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the CPC,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wo Can-Not-Deny’s” can be seen. From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of striving for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struggle history of the CPC, the historical lessons can be acquired. At present, the view of “Two Can-Not-Deny’s”, as an important guide to promote th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is practically significant to correctly

作者简介:李风晓(1997—),女,山东济南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李宏伟(1982—),男,山东沂源人,教授,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understand the Party's history and strengthening historical confidence, as well to continuously deepening reform and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n all-round way.

Key Words: “Two Can-Not-Deny’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PC);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2013 年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两个不能否定”,即“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1][4]},同时清晰阐明了这两个历史时期的本质特征和历史定位,认为它们“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1][3]}。这一重要命题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涵:一是要用辩证的、历史的和实践的观点看待这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二是这两个历史时期都是社会主义建设探索进程中的阶段;三是这两个历史时期是前后承接、相互统一的,不能将其割裂和对立;四是要正确认识这两个历史时期中出现的失误,不能因误走弯路就否定其间取得的重大成就。与此同时,这一命题也包含了理论应随实际情况变化而不断创新的深刻意蕴。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对改革开放理念的阐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是对“两个不能否定”内涵的重申与拓展,他在肯定改革开放对于中国发展具有推进作用的同时,基于过去的发展状况和现实情况,指出在当前改革的重点领域“还有不少硬骨头要啃”^[2],为此应该“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2]。习近平总书记这一坚持系统观点、坚持问题导向的观点,给研究“两个不能否定”提供了新的哲学视角:一方面,应该从万事万物普遍联系的角度出发看待这两个历史时期;另一方面,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借鉴历史经验的同时聚焦改革、发展、稳定中的深层次问题,将创新的理论应用于当前的实际。基于上述认识,本文从事物之间普遍联系的视角出发,探寻“两个不能否定”的理论依据与历史镜鉴并总结其现实意义,以进一步加深对“两个不能否定”的理解与认同。

一、“两个不能否定”的理论依据

无论是中国传统文中的古今观,还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辩证法以及关于发展阶段差异性的论述,抑或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奋斗历史中所形成的实践观与矛盾论,都让我们认识到,国家要想发展,既不能因循守旧,也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而是应该坚持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创新思想,用辩证统一的观点看待问题。应用这些观点,可以发掘出“两个不能否定”在理论方面的合理注脚。

(一)“两个不能否定”是对中国传统文 化之古今观的扬弃

“两个不能否定”所聚焦的争论可从中国传统文文化中追本溯源,这便是“厚古薄今”和“厚今薄古”之古今观的争论,即“法古”与“变法”之间关系的论辩。中国传统文文化中“厚古薄今”的思想倾向非常浓厚,从先秦百家争鸣到晚清各家的著述都有相关论述,尤以儒家学说表现为最。比如,孔子的“奉行周礼”“祖述尧舜”与“信而好古”,孟子的“言必尧舜”“遵先王之法”,或者崇尚儒学的康有为的“托古改制”,都包含着“崇古抑今”的思想取向。虽然这种思想确实在巩固封建专制和维护统治阶级地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封闭了人们的思想,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特别是在晚清时期,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时,封建顽固派仍然拘泥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僵死教条,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由此看来,不知变通、因循守旧的思维方式和观念难以使社会持续取得进步,因而必须予以破除。

既然如此,是否应该完全摒弃先前的观念和经验、一味地立足当下着眼于未来呢?答案当然也是否定的。以中国古代采纳“厚今薄古”思想的典型朝代——秦朝为例,当时的丞相李斯认为,“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

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建立”^[3],即以过去天下纷乱的缘由为佐证,强烈反对淳于越站在“法先王”的立场要求恢复分封制的主张,向秦始皇指明古代诸侯作乱的手段之一便是“道古以害今”,并劝谏秦始皇实施“焚书坑儒”以巩固统治。然而,秦始皇接受“焚书坑儒”建议并实施后,却并未收到预期效果,反而加速了秦朝政权的灭亡。究其原因,就在于李斯夸大了“法先王”的危险性并对其进行过度批判,从而借题发挥,在治国理政方面采取过度“厚今薄古”的态度,这导致了秦朝对历史的蔑视,忽略了对先前有价值的道德理念和合理的治国策略的承继,其后果便是秦朝仅仅存在两朝就被迅速淹没于历史洪流中了。

综上所述,无论是采取“厚古薄今”的做法还是持有“厚今薄古”的态度,都是在处理历史与现实关系问题上的一种错误倾向,在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系的问题上也应该规避这两种倾向。龚自珍说“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这警示我们首先应注重历史的继承性。习近平总书记正是基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而深刻地认识到,改革开放前所确立的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成就为改革开放后提供了政治前提、制度基础、思想理论准备,必须要切实把其中的宝贵经验传承下来,坚决反对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那段历史。同时,他又十分注重历史、现在与未来三者的有机统一,认为不能一味地回顾历史,更应立足当下。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坚持、改革和发展,应吸收前期的成功经验致力于当前的事业,而不能将两者对立起来。

(二)“两个不能否定”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辩证法和阶段论的传承

“两个不能否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之一。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之间存在普遍联系,不能用机械化、片面化的观点看问题,而且事物发展具有条件性。马克思从“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一角度出发,认为人们在这一过程中受到外在条件的制约,即

人们的创造活动受限于“既定的、制约着他们的环境”,以及“现有的现实关系”^[4]。在此基础上,恩格斯深刻点明了事物发展过程中普遍联系的存在,认为如果去考察自然界、人类历史或思维层面的精神活动,“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幅有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5]。由此可以推知,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也是相互统一、相互联系的,它们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个同一过程中的两个阶段,尽管后一阶段或许对前一阶段的错误思想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否定,但是从整体来看,后一阶段是对前一阶段的承接与延续。除此之外,列宁也明确了辩证法的特征和本质就在于它是“作为联系环节、作为发展环节的否定”^[6],这一说法进一步强调了唯物辩证法的联系观和发展观,而且更深层次地指出了辩证法的否定绝不是单纯、任意、全盘的否定。由此可见,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进行全盘否定的做法是片面的、错误的,因为即便是在存在重大失误的“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也在其他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需认清两个历史时期之间的联系,分清主流和支流,而不能将两个历史时期进行对立;同时也应做到不回避党在探索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并对其加以改正,以便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同样认为矛盾存在特殊性,同一事物在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矛盾,因为“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做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7]。他们首先重视人类社会的一般发展规律,提出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或民族必然在斗争方式和实践方式方面存在区别,在发展水平上也同样呈现出阶段性的差异。他们认为:“相同的经济基础……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情况……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8]而这种变异和差别的具体程度以及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9]。列宁应用以上理论,在探索俄国革命和

建设道路的征程中,发现了俄国的社会条件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因此否定了“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等教条思想。他深刻地总结出:历史发展规律“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10]356},推及其他国家,它们也都会有着自身的特别之处,“这些特殊性到了东方国家又会产生某些局部的新东西”^{[10]358}。此理论再一次有力论证了同一事物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所存在的差异性及特殊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是对上述理论的生动体现。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接一个阶段性任务达成的长期过程,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正是这个长期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不仅如此,中国事业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也都有其特殊性,这就决定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发展状况的不同。改革开放前,由于没有经验可借鉴,新中国百废待兴的国情决定了我国不能采取超前的道路,只能稳扎稳打,发展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后,由于已经在前一时期积累了深厚的物质基础、适宜的制度条件与社会环境,且提供了发展市场经济的空间,再加上对一些错误也进行了深刻的纠正与反思,因而在这一时期我国选择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方式是合理的。两种道路的选择都是当时情况的反映,都是当时的真理。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11],更不能因为前后的差别而否定哪个时期。这也让我们进一步领悟到,一个国家要想繁荣昌盛,一个民族要想独立自主,就必须根据自身所面临和拥有的具体条件,选择符合实际的发展路线,并及时调整发展策略。

(三)“两个不能否定”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实践观和矛盾论的创造性运用

“两个不能否定”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过程中持有的实践观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一切事物都是向前发展的,而不是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的,由此应从客观实际出发制定政策、推动实践发

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已然领会到实践之于道路选择的重要性,于是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12]他基于中国国情突破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的重围,选择了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的工农武装割据的中国式革命道路。这种从实际出发的理念在之后中国的发展中起到了指导作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时期,是党在当时生产力不发达、经济文化落后的情况下基于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而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探索时期,因而党在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指导下不可避免地选择了以苏联为师,在不断的试错中摸索前行;而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基于当时经济建设及拨乱反正的需要,邓小平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他明确表示,在没有老师可供学习、没有前人实践可作经验、没有其他国家可作模仿的情况下,要进行当时的事业,就“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13]258—259}。基于此,他高度重视历史和实践的作用,认为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13]271}。立足于改革开放不同时期的特殊性,他提出实践的意义在于它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的要领在于应该“摸着石头过河”。实践也确实证明,他摸索出了一条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虽然当时部分人的思想和眼界还不够开阔,一听到“市场经济”就会产生这条道路是不是“资本主义道路”的疑问,但其实毛泽东在很久之前就给出了解答:“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14]毋庸置疑,实行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来源于实践,改革开放中的矛盾与问题也只能通过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来加以解决。

“两个不能否定”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矛盾论。唯物辩证法作为共产党人分析、处理一切问题的方法,既承认矛盾的特殊性,又强调在众多矛盾中要找到主要矛盾、在矛盾双方中要抓住主要方面。毛泽东在《矛盾论》一文中从哲学高度揭露了党内教条主义错误,指出不能割裂主客观的关系,也不能割裂普遍与特殊、一

般与个别的关系,同样不能割裂部分与主体、现象与本质的关系,对待任何事情都应采取全面的、历史的科学分析方法。不同时期一个国家所拥有的社会条件不同,那么不同时期的发展道路必然各有各的特色。正如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发展策略,因形成于不同的时代和历史条件,所以各有不同的内容与侧重点。从这一认识出发,习近平总书记也深刻认识到中国社会变革的独特性,于是指出“它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而是经过持久摸索、受到实践检验的“原版”,因此需要“立足于时代去解决特定的时代问题”^[15]。

“两个不能否定”同样显示出价值意味上的肯定与否定的区别。对于肯定和否定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明确指出“不应该肯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肯定正确的东西;同时也不应该否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否定错误的东西”^[16],这是对“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做法的深刻批判。要想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就要看到矛盾斗争的过程已经向前推进了,既不能停留在旧阶段,也不能超出当时阶段的现实性,用冒进的、片面的、表面的、主观的眼光与态度看待问题。对于改革开放之前的理论与实际成就,既不能因为它完全符合共产主义的计划经济而对其完全肯定,也不能因为毛泽东晚年的失误而对其全盘否定;对于改革开放之后取得的成就,既不能因为一时的成就而忽略现代化建设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也不能认为市场经济是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背弃,而是应该发挥优势,改正以前的错误,分析发展道路上的挫折,提出应对之法,做好抵御各种风险的准备。

二、“两个不能否定”的历史镜鉴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能够映照过去,也能照亮现实和未来。中国近代史、苏联社会主义探索史以及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的成败得失与遗留的经验教训,为坚持“两个不能否定”提供

了历史镜鉴,使之成为推进改革开放实践的重要参照。

(一)“两个不能否定”是对中国近代史中错误倾向的摒弃

“两个不能否定”的提出不仅与中国几千年治国理政经验的文明传承密不可分,而且与近代以来救亡图存的道路选择有着必然的联系。近代中国,虽然有无数仁人志士为拯救民族危亡而前赴后继、舍生忘死,但是国力的衰微和入侵者的强大仍然使得部分国人在文化方面自惭形秽,与之相伴的是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丧失,导致他们对于以何种理论指引走什么道路的问题难以避免地存在错误认知与倾向,从而作出不当的判断与选择。比如,与革新派相对立的顽固守旧派,他们将自己囿于中国封建落后的思想中不知变通,“以中国之人师法西人为深可耻”,反对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文化,提出修铁路会致使“山川之灵不安”,甚至感觉中华传统文化即将遭遇灭顶之灾;他们也强烈抵制造船造炮、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兴建工厂、与外国通商等。由此,在朝政上的掣肘让洋务运动的成果大打折扣,甚至遭到惨败,阻碍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革新。同时,持先进思想的一派中,有部分知识分子则出现了崇洋媚外的思想,比如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胡适的“充分世界化”、张佛泉的“实质西化”和熊梦飞的“西体中用”等,他们否定中国的历史、制度和文化,认为应全面学习西方。这些思想是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表现,对当时的文化自信造成了严重冲击。因此,不管是“中国本位”还是“全盘西化”都存在极端性,时刻警醒后人应该摒弃这些错误倾向,这为如何对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提供了经验借鉴。

与近代史上出现的错误倾向相同,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也曾有类似纰缪。比如,一些人没有树立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观念,对于如何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存在错误认知,秉持文化上的复古主义,甚至主张用儒学代替马克思主义;还有一些人在思想观念和文化自信方面受到西方思潮影响,导致对西方

盲目崇拜,而且恣意生搬硬套西方理论和话语来解读中国问题、阐释中国实践,在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国历史时,打着自我纠错、自我完善的旗号却在自我贬低、自我否定,丧失了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党的十八大之后这些错误倾向仍不乏其例,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多学习历史,从中汲取思想上与实践上的经验教训,以增进对中国国情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他明确提出“两个不能否定”,目的便是达到对这些错误倾向的归正。

历史与实践证明,不管是顽固守旧、不知创新的思想,还是一味激进革新、否定历史的做法,都在掣肘中国历史发展进程,这要求我们必须摒弃这些错误倾向。一方面,要警惕历史虚无主义与民族虚无主义。“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历史被毁灭的国家和民族是站立不起来的。日本侵略者曾以“中国社会亚细亚的停滞性”为侵华制造合法性根据,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尽苦难。当前中国在意识形态层面也面临着类似的挑战,比如,将新中国的发展与中国历代王朝的更迭一概而论,这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成就与意义,因此,如何以批判的态度正视这种消解中国历史的观点是当下我们所面临的一大挑战。另一方面,面对新时代发展实践和主题变化所带来的新问题,思想观念必须因时而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站在历史的新高度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独特地位,既要总结历史经验,也要立足于当下、着眼于未来,以接续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

(二)“两个不能否定”是对苏共发展史教训的吸取

苏共连续执政 74 年的历史给当前我们如何对待“两个不能否定”提供了经验与教训。列宁在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并没有什么经验可供借鉴,马克思主义只是对共产主义社会进行了设想,而没有提及具体建设细节,列宁以这些设想为依据但又不拘泥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已有理论,而是基于俄国实际提出了新

的经济政策,表现出了不被过去所束缚、敢于开拓创新的求实精神与勇气。

如果说列宁的探索给我们提供了经验,那么苏联的解体则给我们提供了教训。1956 年,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目的是要纠正斯大林时期在思想理论建设方面的一些错误导向,但是却导致了对斯大林的全面否定。客观来说,斯大林确实犯了一些错误,但是他的历史功绩也绝对是不可否定的。赫鲁晓夫这种否定过去的历史虚无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立场和唯物辩证法的偏离。后来,戈尔巴乔夫更是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完全代替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本质上是对苏共奋斗史的全盘否定,最终导致了苏共垮台、苏联解体。

推之于中国,我们需要认识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不能否定过去的历史,而是应结合实际勇于创新;同时,要坚持一分为二地看待问题,永远都不应该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和立场。对于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我们既要承认它在整个建设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也要敢于承认其间所犯的一些错误;对于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既要看到它的合理性,也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在坚持人民立场的基础上,结合新的实际和要求进行创新。“两个不能否定”就是在继承历史观点并对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新变化新特点辩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的,对其需要长期坚持并以其引领实践。

(三)“两个不能否定”是对党的奋斗史经验的传递

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中,曾经多次面临革命和建设道路的选择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以洞察世界的眼光,认识到中国的特殊国情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依据,最终作出了正确的取舍,选择了适合不同阶段的不同发展道路。

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曾因简单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而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因此,毛泽东反对革命队伍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即“开倒车”的顽固做法,而

是不局限于经典理论框架,敢于创新,超越苏联模式,开辟了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探索中国建设道路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曾面临社会生产力大幅下降和党内出现思想错误的局面,邓小平同样超脱了以往的范本,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实践。迈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洞察国际国内新形势,立足于新的实际,不仅对理论进行创新,而且强调不能忘本,要求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继续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些道路和策略的选择最终都取得了重大成就,都对不同时期的中国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历史和实践证明了这些选择的正确性,也佐证了“两个不能否定”的合理性。

由此看来,人类社会实践具有多样性,往往会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和时空的不同而呈现出实践方式、路径、阶段等方面的差异性。因此,无论是以某种理论否定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路径和方式,还是照搬他国模式而否定本国模式,抑或是以本国某一历史时期的成就来否认其他时期的实践历程,这些做法都是错误的。应当基于实际情况认识建设和改革每个阶段的路径差异性与结果统一性,对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认识也是如此,必须用辩证统一的方法来看待它们。格鲁内尔曾说:“人类经验应当有开端、中间过程和目标或实现。”^[17]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正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不同的中间过程,它们密切联系、互相贯通,共同承载实现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

三、“两个不能否定”的现实意义

当前世界情势变化快速而且错综复杂,可能无法全面规避其对国家发展进程的影响及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冲击,为此我们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政治定力。坚持“两个不能否定”,是对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正确认识,是在党的历史认同基础上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行动原则。

(一)“两个不能否定”对于加强“四史”学习至关重要

重视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历来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今天是从昨天发展而来的,同样地,立足于当前才能走向未来。古今中外,由于社会性质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明发展程度也不同,但历史不容随意解读,而应予以清醒认知。如果对党史和社会主义建设史没有清醒的认知,肯定会动摇我们继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意志。为此,我们应继续深刻学习和研究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以加深对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实践史的理解与认同。

“两个不能否定”是加强对“四史”学思与感悟的关键。“两个不能否定”是新中国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中的重要观点,呈现的是对党史的认同和对改革开放史的正确认识。从“两个不能否定”的内涵中,我们认识到,对于历史,应该以全面、辩证的观点去看待,因为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由于时代条件、发展水平等方面限制和影响,其中难免会存在一些陈旧或糟粕性的东西,对此我们既不能毫无保留地全部接受,也不能采取绝对主义全盘抛弃,而是应该在扬弃中继承,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对待历史遗产:批判继承、古为今用。这为认识“四史”提供了正确方法,是学习“四史”必要的思想前提。

“两个不能否定”为进一步加强“四史”学习提供了新思路。“两个不能否定”蕴含着基于历史发展现在、基于现在走向未来的深刻思想,应该把这些思想渗透到学习“四史”中。首先,要贯通历史,用宏大的理论视野,用全面的、历史的方法,将“四史”置于中国整个发展历程中进行学习研究;其次,历史是在传承发展中前进的,针对新形势新变化,需要用新的理念和方法来应对,应将学习“四史”同具体实际相结合,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吸取实践智慧,服务于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大局以及解决现实的、国际国内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从而做到以史为鉴、把握当下、推动工作;最后,应将学习“四史”的成

果转化为推进社会发展的动力,从历史中汲取精神力量,从而做到勇敢担当、一心为民,奋力实现伟大梦想、创造新的辉煌。

(二)“两个不能否定”对于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十分关键

“两个不能否定”是继续全面深化改革的必要前提。当前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于新情况采取什么样的发展策略,是建立在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系正确认识基础之上的。如果过度强调改革开放前的探索史,而忽略改革开放后的建设史,无疑会直接否定当前深化改革的必要性;如果仅仅看到改革开放后的成绩,而忽视改革开放前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的物质、制度与思想基础,将会导致历史的割裂。因此,只有坚持“两个不能否定”,注重吸收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有益经验,正确认识两者关系,才能继续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发展。

一方面,要深刻认识到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来的,是在破解难题中不断深化的,改革开放是一项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完成的长期且艰巨繁重的事业。因此,我们一定要汲取历史中的重要经验,对历史建立清醒的认知,继续坚定道路并高举旗帜。推进改革开放、制定方针政策,都要牢牢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充分体现这个基本国情的必然要求,坚持一切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我们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发展变化的现实中,努力避免任何超越实际、超越阶段、急于求成的倾向,要坚决反对任何落后于实际、无视深刻变化、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观念和做法。既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又要牢牢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正确方向。

另一方面,“不发展有不发展的问题,发展起来有发展起来的问题”^[18]。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攻坚期与深水区,推进和解决问题的难度仍然很大,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才能使改革开放再上新台阶。而利益格局调整、思想观念多元导致凝聚改革共识的难度逐步加大,这是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难题之

一。因此“进一步解放思想”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具体要求和重要目标,做好统一思想、凝聚改革共识工作迫在眉睫。这种情况下,坚持“两个不能否定”,有益于我们冲破思想固化的藩篱,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进而广泛凝聚改革共识,不断把改革引向深入。

(三)“两个不能否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影响深远

时代的发展,给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一些难题。全球性的重大问题仍然此起彼伏地出现,世界范围的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严重不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持续蔓延;与此同时,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愈发难以为继,人类社会进入了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阶段。从我国现状来看,我国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经济、科技、国防等方面的实力大幅提升。但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加紧了对我国多方面的渗透攻击,使我国遭遇“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的风险依然存在。此外,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长期存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愈加激烈、一些安全问题频繁出现等也给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带来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和重大风险挑战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战略定力。

一方面,面对新时代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坚持“两个不能否定”能让我们更加认清当前的形势,从而涵养我们的定力与保持坚定的意志,这是应对国内外形势变化的现实需要;坚持“两个不能否定”有利于认清改革开放在决定当代中国命运及实现中国梦中的重要地位,从而在树立正确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在面对各种迷惑人心的挑战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保持更加坚定的信心;同时,坚持“两个不能否定”也有利于向世界上其他国家展示我们所选择的道路的进步性与优越性,从而展示良好的中国形象,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

供发展方案,并进一步增强我们的“四个自信”。

另一方面,坚持“两个不能否定”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必然选择。“两个不能否定”的深刻内涵指明了我们进行道路选择的方法本质:在拥有14多亿人口的中国,要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以及其他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必须根据自己的特殊国情选择走自己的道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不同时期尽管采取的方针政策有所不同,甚至出现了一些挫折和失误,但是从整体方向和发展结果来看,我们所走的这条承上启下、独立自主的道路是科学的、合理的。“两个不能否定”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防范出现颠覆性错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中,堅守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底线^[19],只有这样才能有力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纵深发展。

总之,“两个不能否定”是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系的正确认识,它既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也符合历史发展的本来面貌,同时也是站在现实的高度来认识和理解历史问题而得出的科学论断,对于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当前,我们坚持“两个不能否定”,一方面要以史为鉴,汲取之前的历史经验教训,以便更好地面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挑战;另一方面要以客观实际为依据,辩证而全面地认识、分析、把握问题,及时提出、研究、运用新思想、新理念、新方法,从而更有针对性地指导实践,做到对症下药、精准施策、化解矛盾、破解难题。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 [2]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1).
- [3]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253.
-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49.
-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23.
- [6] 列宁.列宁全集:第5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195.
-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329.
-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894.
-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458.
- [10] 列宁.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1]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8.
- [1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33.
- [1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 [1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84.
- [15]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76.
- [16]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74.
- [17] 格鲁内尔.历史哲学:批判的论文[M].隗仁莲,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31.
- [18]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82.
- [19] 王伟光.开辟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境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6.

(责任编辑:李秀荣)